



编者按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这天的天气不好，浓云密布。一群有组织无纪律的爱国青年，喊着口号走上街头，试图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把这层阴霾统统燃烧掉。现在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会慨叹：那时的人们，活得真来劲！而我们纪念的，或许就是这分精彩……

# 向青春致敬

## ——纪念五四运动

## 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燃者——梁启超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德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学生冲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来，正在该处的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烧，军警当场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北京学生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和侨胞也展开了爱国活动。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北京政府被迫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但又下达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分组出发到街头演讲；6月4日出动更多的学生进行宣传活动，两天内竟有近千名学生遭到逮捕，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人民首先起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大力声援北京学生。特别是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发动了有六七万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南京、天津、杭州、济南、武汉、九江、芜湖等地工人，也都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为之震惊，不得不于6月6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10日宣布“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胜利地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准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和思想上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运动的经过已为人们所熟知，毋庸赘述，而梁启超在这场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鲜为人知。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的1917年11月30日，梁启超辞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职务，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又筹措了10万元经费，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此行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诉衷，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同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国际联盟



同志会，北京大学有教职员和学生千余人参加，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

龄、汪大燮、梁启超等10人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主；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2月18日，梁启超等人至巴黎。他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

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北京政府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3月中旬，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报告他所了解到的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情况，电文如下：“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掘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密，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于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愤慨。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

这时，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发回国内一封电报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測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其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随之国内就掀起了一场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上海商业公会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启超，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经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某国利用倾向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迹，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专使，注意大局，幸甚。”

## 五四风云人物——蔡元培

策。蔡直言相告：“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并拒绝去教育部。（《蔡元培研究集》，第3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当晚，蔡元培回北京大学商讨营救被捕学生事宜。他说：“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5月5日下午2时，蔡元培与北京13所大专院校校长召开联席会议，要求释放学生。蔡元培在会上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又表示：“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

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决定释放学生。5月8日拟下令查办蔡

元培并内定马其昶为北大校长。5月9日，蔡元培“引咎辞职”，秘密出京。他说：“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5月11日，蔡元培在旅途中给北大学生来信，解释他辞职并出京的原因：“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忱。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前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厅总监之

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边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转引自杨亮功、蔡晓舟合编：《五四》，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五四运动取得光辉胜利后，在北大师生与各方人士的强烈要求之下，蔡元培于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终年72岁。



## 五四风云人物——陈独秀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这份杂志因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上海青年》刊名有雷同之处，故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由于《新青年》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被束缚于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因而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点燃了至今不灭的思想解放的火炬，陈独秀也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然而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这一天，陈独秀并未出现在集会现场。直到5月7日下午，他才写信给远在上海的胡适报告当时的情况：“4日下午，京中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馆，适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饱打，幸亏有一日本人竭力保护，送在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确定。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

然而，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这一天，陈独秀并未出现在集会现场。直到5月7日下午，他才写信给远在上海的胡适报告当时的情况：“4日下午，京中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馆，适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饱打，幸亏有一日本人竭力保护，送在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确定。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

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德办被捕的学生30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22人），整理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信中所说的“大学”系指“北京大学”，“周报”指《每周评论》，“两个日报”疑指《晨报》与《国民公报》。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期间最为轰动的表现是起草并亲自散发了著名的《告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保障市民集会言论自由等“最后最低之要求”。6月11日夜，陈独秀在前门外新世界游艺

场五层楼上向游客抛撒传单时，当即被北京警察厅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密探逮捕。消息传出，全国舆论沸腾。各社会团体、名流、学者、青年学生纷纷通电发函营救。革命青年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指出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今日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而“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陈君为这两样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但是，“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文章结尾写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对于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李大钊后来指出：“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国民的学生的日子。我们在今天应该把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痛史，细数从头，把五四的精神，牢牢记住，誓要恢复国家的主权，清洗民族的耻辱。”

行民族自决。陈独秀被捕入狱后，李大钊立即设法营救。9月16日陈独秀获释，李大钊在《新青年》6卷6号发表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说陈独秀的影响“好比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为了陈独秀的安全，李大钊跟高一涵等商议，先把他安排到王星拱家中暂避。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化装为外出收账的商人，雇一骡车，亲自将头戴毡帽的陈独秀送至天津。旅途中，两人商谈了建党的问题。此后，陈独秀从天津乘外轮去上海，开始了建党的筹备工



## 五四风云人物——李大钊

勇、又危险。”（《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高一涵先生谈李大钊同志的历史》手稿本）

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指出仅仅痛恨曹、章、陆等卖国贼，仅仅以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为仇敌是不够的，因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这强盗世界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文末他强调了“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

行民族自决。陈独秀被捕入狱后，李大钊立即设法营救。9月16日陈独秀获释，李大钊在《新青年》6卷6号发表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说陈独秀的影响“好比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为了陈独秀的安全，李大钊跟高一涵等商议，先把他安排到王星拱家中暂避。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化装为外出收账的商人，雇一骡车，亲自将头戴毡帽的陈独秀送至天津。旅途中，两人商谈了建党的问题。此后，陈独秀从天津乘外轮去上海，开始了建党的筹备工

作。

## 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青年》

《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16开，每月一号，每6号为一卷。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2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以及鲁迅轮流编辑。

该刊创始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民国四年（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便开始准备筹备《青年杂志》，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

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几入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非科学的。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1916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来信，信上说该杂志同青年会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同名，要求

《青年杂志》改名。于是自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最初的撰稿人有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刘半农、易白沙、吴虞，其中陈独秀为主编。1916年2月起因护国战争停刊7个月。1917年1月因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总部迁往北京，办公地点在东华门外箭杆胡同，但印刷地点仍在上海。1917年8月后又因故中断4个月。1918年1月15日复刊出版第四卷1号，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大弟）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到编辑队伍当中。

由于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又停刊5个月。10月迁回上

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919年12月的第七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919年12月1日第七卷第一号《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七卷一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第八卷第一号（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北京编辑部被取消。改由青年社发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1921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后又任主编直到1922年7月停刊。

综合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